



不平等挑战中国——专家座谈暨新书发布会

2013年11月29日，周五，下午2:30—4:0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21 教室

文字记录

王天夫：各位同学，各位老师，还有各位来宾，下午好。

今天是我们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一个有关收入分配的专家的座谈会，我们也借此机会，把我们的新书推介一下。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新书，这个书是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在去年的9月份我们就说过有一个闭门专家的讨论会，请了很多专家，有政府机关的，有学校的，有智库的，等等。我们开了一整天的研讨会，然后在这个研讨会的基础上，又研讨会的会议机要，各个参会的学者回去之后根据自己的专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又专门为这个书提交了论文。最后这个书经过长期的编辑、整理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雪莲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最后这本书得以出版。刚才在底下讨论的时候王丰老师还说到，到现在讨论收入分配的书很多。我们这个书出版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很犹豫，怕材料不足、不够丰富，但是这个书真正出来之后，现在看起来，这个书到目前为止不敢说最好，也是相当不错的一本书，极力推荐。

今天邀请了这本的主编宋晓梧老师给大家做一个主题的演讲，然后由王丰老师和周云波老师作一个评论，我们再开放地讨论。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三位来宾，宋晓梧老师一直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第一线，从事领导工作，他现在还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的院长，所以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一直还是在领导着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和宣传。他这几十年来工作，他在收入分配上有非常多的经验和体会，待会儿我想大家可以直接领略得到。王丰老师是刚刚从公管学院还有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离开，到了复旦大学，这次他专程回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周云波也是我们去年9月份研讨会的出席者，也是我们书里面的作者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教授，今天非常荣幸他能够参加这个研讨会。

别的不多讲，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宋晓梧老师给大家做演讲。

宋晓梧：非常高兴参加这个非常小型的但是非常重要的研讨会和书的发布会。

刚才王老师说这本书是收入分配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其实这本书有一些理论上大的观点，同时也有很多实证的收入分配方面的考究和研究，也对下一步改革的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起得比较好，叫《不平等挑战中国》，我研究收入分配年头比较长，因为我就是学劳动经济学的，所以这是我的本职。从80年代开始一直就关注收入分配研究，大家可以从简历上可以看到，我曾经担任过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一直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从计划经济下的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这样一个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这有它的合理方面。我们从城镇基尼系数0.2的这种情况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公的少数的一些国家。比我们基尼系数更大的无非就是南美、非洲，亚洲的没有几个，一两个，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是研究收入分配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实例，从经济学、经济史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是怎么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时代，经过一代人，演变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不公比较严重的国家。

现在我们说已经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了，已经是不平等在挑战中国，所以这个书名用得好，跟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它的一个指导思想是符合的。什么指导思想呢？习近平总书记说了，我们这次写这个决定，是问题导向。可能大家要看公开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提这个问题不太深刻，开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处讲的都是35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实际上内部讨论确实是问题导向。今天作为这样一个小范围的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问题导向。如果都是成绩，那还有什么问题导向，那就是乘胜追击的问题了。不是的，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说，就是前阶段，我们改革的侧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如何解决好合理的分配制度，分配关系，这是一个新的阶段。

说挑战中国，它就是个问题，具体在哪些方面挑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全面的挑战，不要把收入分配看成一个纯经济问题、一个纯学术问题。首先这么多年来我们关注经济体制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是提出以经济改革体制为重点，以它为重点来协调分配各项改革。首先不平等在挑战我们的经济。挑战哪些方面呢？在投资和消费方面，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衡，已经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结构调整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十二五规划提出来的发展方式转型是工作主线，主要任务是结构调整。第一大结构就是投资与消费。消费不足是怎么造成的？和收入分配不公，收入不平有直接的联系。有些经济学家不太赞成，说我们中国消费还低吗，消费和多少年前比，我们已经提高了很多，消费在全世界比，我们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但是结构不是和过去比

，也不是和别人比，是自己的结构问题，跟发达国家比非常低，跟世界平均水平比非常低。这种情况怎么能够持续呢？它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全球化低劳动力成本使我们的产品大量出口，通过国际市场来弥补我们的消费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幸，这个变化就发生了。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去年今年的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使得欧美加上日本国际消费输出能力大幅度下降，我们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当前非常严重的问题。

本来从资本原始积累角度说，马克思当年研究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就说了，资本主义有荒谬的矛盾，就是资本过多地压低了劳动成本，所以造成消费不足。像我读马列、读斯大林市场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社会将面临一种荒谬的矛盾而解体。橱窗里生产的商品，由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没有能力消费它这样荒谬的矛盾而解体。话说得很有意思、很好。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出现了这个矛盾。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对我们社会问题的挑战。由于收入不平等，特别是这些收入不平等还有固化的趋势，上下流动困难。农民工流动可以，但是从农民工跳出龙门去，不是农民工了，这就很困难。现在我们是富二代、官二代，现在又出了垄二代，垄二代是新华社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调查小组，他们调查提出来的，就是发现电力学校的绝大部分学生是电力部门的子女，即使不是电力部门的子女将来毕业以后还是很难进入电力部门。所以他们起名叫垄二代，国有垄断行业也有这种趋势在里面。相对应是什么？就是第二代农民工甚至第三代农民工，致使社会发生大的裂痕的一个重大问题。潜在的影响对社会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一，经济面临挑战，二，社会上面临挑战，三，政治上面临挑战。这个问题，研究收入分配的人很少讲，但是我这本书里面提了一下，提得不够透彻。为什么说政治上面临挑战？因为我们党、我们的执政党，一贯讲究是为人民服务，一贯讲究三个代表，一贯讲究为最广泛人民的利益服务。我们可以承认你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饭锅阶段有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我们也赞同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小平说最终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出现了这样一个二代三代农民工，出现了普通劳动者收入大幅度降低，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现在也有一些学者说中国的收入分配不是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这个过程，他们可以说这个曲线那个曲线，画了那么多曲线。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以其他的市场经济，比如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增长，我们本身应该具有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制度，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你的社会主义跟人家见了面很尴尬，交流起来很尴尬。

比如我们遇到一个德国的学者，遇到挪威学者互相交流的时候，你跟人家说好象不平等程度比人家高很多，我们社会主义的理念不是这样。刚才我讲到，我们可以承认在某一个阶段，我们是这样的情况，但是长期来看，我们一定到了一个发展阶段的拐点，就是我们应该从各种方针政

策中调动积极性、调动人家先富起来，转向先富帮后富，转向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这是对政治制度的期待。否则即便长期持续的话，我们的执政党在政治上也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现在我们跟国外学者交流起来就觉得比较尴尬，去年我在海南，前年，在海南他们和挪威一个研究所合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挪威人说，说我们是有混合经济的，但是我们做的平等，显然要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我说我去挪威学习过，了解一些情况，比如对于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我就体会很深，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都讲，因为我有亲身体会。有国有企业不怕，有国有垄断企业也不怕，比如挪威的北海石油公司，它是规定100%的国家控股，不允许向私人和外国出售。100%国家归国有企业，但是你知道石油公司的高管，就是它的总经理或者叫总裁，拿工资拿多少？我们1989年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你这个高管拿多少钱？高管说就像刚才给你们送矿泉水的那个人，一般勤杂人员，是他的工资的三倍。所以当时去学习的企业家代表团就有点想不通了，说你们这种高管就相当于中国的石油部部长，那么从送水工到班组长到工段长到车间主任再到厂长再到局长，再到部长，收入才差三倍，那么如何职工调动积极性？这是我提出的问题。

挪威接待我们的讲解人就愣了，他想了一会回答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但是在中国只有钱才能调动积极性。我们回来讨论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和挪威发展不是一个阶段。我们那时候大概人均几百美金。人家是两三万美金。我们还是温饱层次，要靠物质来调动积极性，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问题的。

再有一个像挪威这样的北海石油公司，你没有看到任何国民或者是理论对它的批评，所以你说这种事件一桶油，两桶油了，你们工资高了之类的。他的公司思虑就和社会一样，他所赚来的钱拿来搞全社会的福利，所以国有不害怕，垄断也不害怕，他就是垄断，分配搞不好大家就有意见，现在我们垄断这个行业的收入这么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谈了这么多年，这也是对我们治国理念和基本的政治理念的一个挑战。

现在你说来说去内部逻辑说不通，最后你拿出数据来，说这是严重的挑战，这是经济、社会、政治，我觉得对文化对伦理道德也是一种挑战，这样一种不平等时间长了就会造成社会心理状态的扭曲，就是遭到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

咱们孔夫子曾经说过，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取之有道、发财合理，我是勤奋劳动得来的，就像比尔盖茨。我看没有什么人对人家的财富提出质疑。现在由于我们的收入分配大量地权钱交易、灰色收入，这本书里斗提到了，这种人富了，这对我们的道德观念就有了很大的扭曲作用。这是我在网上的词呀，过去孔夫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说只要富与贵，可学岳不群。华山派掌门人为了得到葵花宝典，把自己老婆、女儿、徒弟全部害了，都不要了，只要最后我是天下武林之一，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现在这种人的案例太多了。如果你对取

不义之财的人对收入分配上没有限制，就是很大的问题。很多的影视作品，暴露了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但是很多人在蜗居的状况，这个都在是大的问题上。这是对我们下一步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挑战。

各位学者，包括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各路学者，对于不平等的问题，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提出了方方面面的建议，献计献策，非常高兴地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对收入分配导向型的描述是非常清楚。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较，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五大直体系来构成。第一个是基本经济制度，第二个是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三个是宏观调控体系，第四个体系是一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五个是以基本社会保证为主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认真比较一下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不同点。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面大大地扩大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国防都写到了里面。在写经济体制里面，前三个体制都单独写了，经济基础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宏观调控，它没有把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单独写，但是他写的问题很清楚，导向很清楚。比如说收入分配要规范建立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另外提出要重点倾向提高劳动报酬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开展职工权益，让各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都涌动出来。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提的很明确，要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放在第一位了，这和原来提的不一样。原来叫低水平，后来叫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稍微有点修改把广覆盖改成全覆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和蔡访被委托些社会保障这一块，明确就是问题导向。主要问题就是两个：不公平，可持续有待研究。如果一次分配不公的话，二次分配通过税收扩大了不公平。和外国比较，经过二次分配差距有所下降。中国这方面很汗颜。我从事这方面工作三十多年了，我画不出这样的曲线。当然了，扶贫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更多的例子的城乡之间的逆向转移。城乡之间本来的一次分配差距是 1.33 左右，但是加上二次分配，实际的差距扩大到 5、6 倍。像区域和不同人群之间双规制的差距说什么也解决不了了。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利益问题。我老开玩笑，我说我 1998 年发表了文章，两个八年都过去了，还是解决不了。还有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它在这里没有写，比如农民的城，它就放到城乡差距里去了。把收入分配问题分了。总的来讲符合现在经济发展的下一步需求，但是也不太乐观。平均主义大锅饭从 49 年算起到改革开放也有三十多年了，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也是积重难返了。而且比打破平均主义更难。当时大家都穷，你多拿两块没什么。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现在差距太大了以后，人们心理的落差就很大，我能力比你强，你拿的比我多，人们就不服。而这种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你要再进一步改革，就很难。比如说双轨制，你是把公务员降下去呀，还是不动呀、现在解决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呢，李克强总理就曾经讲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动改革

。有些问题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它就是解决不了。最后我想讲，我们面临不平等这样挑战，要全方位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不落实就是写在文件上的改革。

谢谢大家。

王天夫：谢谢宋先生，宋老师讲的非常全面，刚才简单讲了一下不公平的后果，以前因为是宋会长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有一定了解。下面请两位，这个书的作者王丰老师和周云波老师来做点评和展开讨论。

王丰：谢谢天夫老师，谢谢宋晓梧会长。我想讲三点，第一个是把这个书的情况再补充一点；

第二就是把当时书里面的一些内容跟刚才宋会长讲的比较接近。第三，我也拿了重大改革的决定，我有一些看法，在宋会长的基础上再讲一下。这本书实际上是我们，就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我觉得很有两个重要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员和清华-布鲁金斯中心组织的一个闭门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他当时国内最活跃的一些学者、专家都请到了，而且一天很深入的讨论。比如说这面有社科院中国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老师，他是从1988年开始就组织家庭收入调查。这个书是宋先生、王天夫、李实老师和我本人把这本书整合到一起。李先生我希望他能来参加，他去国外参加活动。清华、社会科学院，还有很重要的国家统计局在做这方面研究的同事，蔡昉也做了分析。在这个会议基础上，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把会议内容集中起来，写一个前言。第二是把会议的讨论，经过记录整理放在书里面。第三在会议之后，我们把当时参会的一些学者，同时把没有参加研讨的老师比如蔡昉老师的文章放进来，还有一些国际学者的文章都放在一起。这里面很多文章我觉得对于研究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的。西南财经大学的甘犁教授，他的文章和李实的对话都包括进来的，还有收入分配的一些文章，再加上一些国际比较，所以这书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下面讲到第二部分，就是题目。我们之所以去年9月份做这个会，而且这个今年11月份出来。除了去年的社会上讨论，最近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有期望、有信心的阶段，大家都在喘一口气。去年讨论这个问题非常热门，一阵一阵的。当时中央是有承诺的，说去年年底之前关于收入分配的方案要出台。最后没实现有承诺，胡温政府马上在完成任期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方案。现在大家可能也忘了这个方案是什么内容。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很全面的问题，对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所以当时要组织这么一个活动。

我想，我们现在从比较长的历史观点来看，是经过几十年的经济转型之后，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完全是一个新的特殊的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计划经济。对我们参会人来讲，后来我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是一次中国社会重新组建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不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而且是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这个时候就包括我们要对现在新出现的重要现象，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深思同时对原因进行一些系统的分析。

这书里边归纳出来这四条，之后就对症下药，你先要有这个病症，第一条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收入分配这么不平等，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大的反响。去年反响很大，明年反响可能也会很大。这种反响可能会形成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挑战，这种挑战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波及。为什么这有这情况？第一个就是权力对市场、对经济的侵蚀。我们现在不是在寻租，我们政府是在设租。赚了钱之后撤。所以这个比寻租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收入分配不仅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关键是这个过程和机会，所以当你权力来侵蚀市场的时候，这里的结果，大家反映的不仅是经济上社会上的不公，对政治体制产生很大的反感。

有一个同志说现在某些官员最喜欢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说计划经济的时候有权力但是你什么也没有，但是全球市场经济以后，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却不能全部占有。现在在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下，市场能给你创造财富，你用权力可以获得财富，我觉得一针见血，第一个问题就是权力和市场，我想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一次分配的倾斜，我们在投资，在储蓄方面的倾斜，同时消费在老百姓的劳动收入方面，首先占得很少，这里面有很详细的分析。

第三个问题，税收制度是一边倒的。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不利于收入分配的。

第四个就是刚才宋会长讲到，就是二次分配逆向转移。刚才讲到了很多很具体的例子，城乡也好、人群也好。比如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是逆向转移，家境好的人能上好的大学，比如 985 大学，211 大学，那么国家的投资就会给 985 院校和 211 院校。学生来读书奖学金、机会多很多，出去工作机会也多，例子很多，从地区之间，从城乡之间，从人群之间，包括教育制度、医疗各方面。

所以这四个方面是当时的讨论会大家讨论完之后归纳出来的收入分配主要有这么四个制度性的问题。下面要讲的是我们现在怎么来应对这些制度性的问题。

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过一个专门讨论调整收入分配的方案，现在大家都不记得什么内容了。最新又出了，两个星期前刚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决定里面是 16 项 60 条里头，确实在其中有一条，这个是在第 12 项里边的第 44 条，这就是放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里头，最后有这么一条，就是讲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这里讲只是 60 条里边的一条，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现在你要看文件的话，无论讲城乡一体化，无论讲税收制度的改革，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实际

上它都是和要调整收入分配有关系的，所以刚才宋会长也讲过，很多地方如果能够做到，应该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希望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因为这里也提到国企的公司制度很多方面都有，散落在文件的各个部分里面。

我们当时很的学者集体对收入分配这么复杂的问题，首先讲它的危害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应对这个问题，其次把它归纳出来，几个大的方向，下面就说是提一些建议，当然我想这次政府的报告面面俱到，这些也考虑到的。下面的问题就像宋会长讲的我们能做什么。

待会儿还有时间提问题，周老师做了演讲之后。大家肯定会问哪些地方不足，我觉得要看决定，第一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很不足的。讲到以后要增加它的利润贡献，这是个具体目标，其他的方面，还是要在肯定了非公有经济的地位同时，还是坚持了公有经济，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短时间改变的，我觉得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很含糊的，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第二，一方面这是历史性的肯定了市场，市场经济在调配资源上面，有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把政府的权力，说政府是协调，但是现在的感觉是政府希望要多做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担心，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改革问题，这里面提到很多，要扩宽文化，要减少审批，如果讲到这些问题。第一个是权力不能得到真正的约束，市场和民间没有更多的自由；第二是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真正下决心改革，我想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恐怕还是很遥远，要不做的话，我想这个风险是巨大的。

讲完这个我就结束。我们想一下，不说别的，我们现在城市里面有两亿多外来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对于他们的二代来讲，我们现在不仅看到的是有富二代、官二代和垄二代，我们还有很多民工的农二代，这些人如果说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往上，就是说社会纵向流动的话，这个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比如上海和北京，我看上海的数据，20岁到34岁年轻人里面，60%都是外来人口，所以这些人如果说对他们来讲没有一个很好的公平的社会机会的话，这个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都会是一个不公平，而且是很危险的因素。同时需要做的事情不仅是我们刚才讲的权力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我们真正希望要建设的这些基本社会保障，像养老、像医疗。我们跟时间赛跑能不能跑得赢。因为在有钱的情况下，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做，老年人口在增加，得病的人口在增加，这时改革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就丧失了一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社会很有可能变成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社会，就是富裕了很多，但是陷入很不平等、流动机会很不开放的状况，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我想这就是我看书和听了宋会长的演讲之后做的一些补充。

周云波：首先我来说一下，我们这本书，宋会长和王丰主任是主编，当时我也参与了，名字非常有意思，《不平等挑战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原

因是什么？第一它关系到社会稳定，另外它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问题。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本世纪初，很多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这里面有南美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应该说收入分配不是唯一的问题，但是却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大概平均是在 0.47 左右，我们国家，中国按照 2011 年的数据，我们现在是 5000 多，基本上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偏上一点点的收入水平。我们的经济系数按照官方的数据我们 0.42，可能实际会更高一些，我们正好处在这样一个临界点。所以收入分配解决得好与不好，关系到我们将来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水平。

另外，收入分配问题，它改起来很难，刚才宋会长和王丰老师都提到了，因为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第二它牵扯到很多部门，比如税收改革部门、税务，国有企业肯定要和国资委联系，还有农民问题，所以它牵涉的部门也很多，改起来比较难，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二点，这本书里面讨论的问题跟收入分配有关，讨论得很全面，也有很多反思，包括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导致收入分配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

第三点，当时参与这部书的一些学者们，我除外，其他的学者我觉得都是国内最好的顶级的研究收入分配的老师，而且当时氛围很好，观点是相对尖锐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禁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

我就说这么多。

王天夫：现在三位嘉宾都演讲完了，现在是敞开，大家有问题的就提，可以针对某一位特定的嘉宾，也可以自己提一个比较宽泛的问题。

提问：老师好，我是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是毕业留校的，93 到 98 年的时候，当时克强总理也做过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校长，我的问题是有一个说法，说在封建社会的时候可能要几十万人才能够供养一个国王，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有个杰出的人才，他可以为几十万人创造机会，带来便利，比如像百度的李彦宏。我的问题是，我们的收入分配考虑的是有了这种成果怎么分，特别是中国现阶段，它要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过渡周期必然是很长的。如果现在的体制下，是家境好，有关系有就可以进 985、211 接受更好的教育，因为涉及国家的重要的人才的来源可能会减少，或被制度性的东西去阻隔，就会导致国家人力资源的一种枯竭，我就有这样的一种担忧。

宋老师也提到马克思主义强调两种生产，物质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现在应该很重点地考虑一个重要的人才，他需要哪些，自己的努力和社会的支持怎么样匹配起来？不断促进产生更多的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宋晓梧老师，我是大智慧通讯社的记者。第一个问题，刚才三中全会里面提出部分转化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里面提到国企上交红利 2020 年要达到 30%，更多用于民生，这一点我想请您谈一下看看法。第二个问题，除了国企，收入分配要分散在国企和农村改革中，其中有个说法就是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其中包括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抵押流转等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农民来说有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您之前北师大的收入分配院提出遗产税开征。二月份发改委收入分配意见里面也提出了适时开征遗产税。事实上到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也没有写入三中全会，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新的措施，叫做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我不知道这个和遗产税有什么关系或者为什么这次会没有写入呢？

宋晓梧：国企曾经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 90 年代下岗分流可能年轻人应该知道吧，当时国有企业整体亏损，所以就制订了一个政策叫放水养鱼，抓大放小，小的放掉，大的放水养鱼，你挣的钱留给你自己，不用上交，这一般来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企业他的盈利部分，一部分应该是国家作为国家管理者来收税，另外一部分他要在银行贷款，他要付人家利息，所有者的权力应该要分红的，就像股东一样，但是我们不要了，放水养鱼。放水养鱼是一方面，另外一些政策有利于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有特许经营权，在资源价格上都有相对优惠。这些年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了。当年放水养鱼是有历史条件的，后来就形成了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业食利自肥。实际上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划归一部分作为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提法，那是 15 年以前的事。现在可以说，当时我就具体负责这件事，结果还出了点问题，就是我们来测国有企业上市以后有 10% 或者 10% 几的收入用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完全是内部的研究，大概是 2000 年左右的时候。结果正好赶上那一年的股市大跌，因为报纸上透露出来，中央要把国有企业上市，拿这笔钱去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企业不能再增值了，所以股市大跌，就是我们这个课题透露了消息。朱熔基总理当时严厉批示要查处我，后来证明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成员透露的，是财科所的一位同志，他跟记者说了，说课题组长是宋晓梧，你如果想公开发表就要找他，但是记者很滑头，说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交稿的日子要到了，就先发了这个消息。从那以后国企越来越肥，它的职工的福利这几年很好，超额的利润，不符合规定的福利，住房工资。这本书里面都有，不详细讲了。在比较早，2001 年的时候就提出国企逐步要上交红利，另外要规范国有企业的特别是行政性垄断性行业的职工的工资和高管的年薪和职务消费，这是 12 年前提出来的，但是很遗憾，这些年看来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实际上高管年薪在不断增长，工资差距和竞争性行业在不断的扩大。

这次三中全会主题很明确，到 2020 年根据不同企业要到 5% 到 20% 左右提高到 30%，当然这是很大的进步，实际上 30% 也并不高，别的国家也有国有企业，它的国有企业上交的比率高多

了。我们国有企业又承担很多社会责任，搞很多社会活动，这些问题还是应该把相对责任进一步划分清楚。另外发展混合所有制这些问题，文件里提了。实际上很多问题早就提了，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清楚。关键是真的是不是能一步一步落实，当然我相信这次是有点动真格的，希望能够落实。

遗产税是我让他们发的。遗产税是前年全国政协的开放日，必须要回答一些国外记者和国内记者提的问题，日本的一个读卖新闻记者提出了他要采访我，后来说开放日要见他，我就见了。日本记者做了很多工作，他就像个这方面专家一样，提了很多专业问题，他最后提了个问题，他说我注意到你最近十几年的文章没有提到遗产税，他表示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日本有遗产税的情况，你们为什么收入差距那么大，国际上有很多现成的措施，你们为什么不提？我说在中国遗产税是被认为不适用的，是明确说的。到了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讲税收的时候提出遗产税中国可以收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说遗产税中国不能做，所以很多人没有研究。我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就出了这么个题目，在我们那个研究院，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遗产税。当时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取消遗产税是个国际上的趋势，研究结果不是这样，在美国要取消遗产税，结果有钱的人自己都反对，说这是把我们孩子给坑了，美国没取消。日本是遗产税比例略有降低，但是也是有的，台湾也一直有遗产税，台湾是国民党的政府在大陆的时候就有遗产税。

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是不是一收遗产税富人就跑了，研究结果也不是那样，我们的富人跑去的国家反而是有遗产税的，在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他跑出去的原因不是要躲遗产税，他是觉得看不太清楚发展方向是什么。还有一个是遗产税现在条件成熟不成熟，后来这个课题发布了以后，看到了很多争论，说中国做遗产税条件不成熟，财产也不清楚，财产不清楚有什么遗产税啊？这些问题我认为纯属技术性的问题，也纯属有点书呆子吧，还是有意瞎搅和？台湾没有字画？英国人美国人不收集名画？四十年代就可以收遗产税，现在怎么能说条件不成熟呢？你那计算机这么发达了，你都快上月球了，怎么能收遗产税技术条件达不到呢？我认为这还是利益，有一部分人认为收遗产税涉及到他的利益所以不愿意触动。有些学者不见得自己有钱，但是不知道怎么那么书呆子，提那些问题，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辩论，是这么个情况。你刚才提的问题很好我也特别注意看了，因为在去年你说国务院出台一个指导意见，而且它的层次不高，它不是个具体方案，但是那个里面明确提了要适时研究，不是刚才你说的适时增收，适时研究开征遗产税，所以十二五时期应该按照一个行政工作来做而不是学者在这里吵。但是三中全会没提这个，这个问题应该放在建立更加公平的秩序里面，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

提问：我来说一下，刚才说到农民的资产权的问题。现在中国在国内城乡之间的很大的不平等原因就是农民其实手里也有资产的，他的土地、他的宅基地，这是他最大的资产。但是这个资产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就是因为它不能变现。现在城市人的房子是国家给办了证，我们可以拿去银行抵押，但是这件事对农民很不公平，所以农民的资产权是个问题。另外那位同学提到知识教育，人才问题，我觉得人才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要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这个机会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包括他去就业的机会，包括他去创业的机会。另外一个，除了机会上的平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宽容的环境，实际上那种学术上的创新也好，技术上的创新也好，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很包容的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提问：我是独立的战略咨询顾问。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有个事情一直不明白，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王小鲁他研究灰色收入，我特别奇怪现在计算机和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控制灰色收入？具体的手段，举个例子，美国，美国所有的收入，哪怕是公司对我个人的收入，都有一个四联的对账单，一联送到国税局，一联自己保存，这样企业才能把这个收入作为成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不行。为什么中国做不到呢？我特别奇怪这么大的灰色收入，我想请教各位的看法。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财经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王丰老师跟宋老师，最近各地的政府，西安、南昌、杭州、南京各地都开始了新一轮的房产的调控，他们的政策一个是提高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对借款人资格的限制，可能原来是社保税收凭证一年提高到两到三年，二套房首付比例也是一个加码的开始。我想问一下中国地产市场也是存在很大不平等，这种以二套房加码和限制借款人资格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加长远有利？以往似乎是二套房加码为主，而且更多的是中央来部署，地方再做出动作，这次是以各地政府自己出台的调控的方式来调控，这种税收的手段跟强化借款人资格的手段，你们有什么预期？而且对于房产税的征收，以后房市的调控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谢谢。

王丰：我觉得灰色收入这两天的报道在说人民大学招生的处长，说大概有上亿的资产，他很多钱除了正当手段之外，很多钱不需要送他的人给四联对账单，就是家长自己掏的腰包。送他的钱，和买官卖官的收入不一样，但是那个也不是要对账单的，就是现金来的，所以这种收入，有上月球的技术，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解决不了。

提问：我去美国的时候 80 年代末，只要你现款是 5 千美金，银行就必须向政府报告，中国前几年才把在银行提个十万二十万，现在是五万，才要实名。美国银行有所有的记录，我一回国

我就认为美国是管钱最有效的国家，他不管你在网上说什么，在大街上说什么，中国政府是要管人说什么，但是钱全不管，什么钱也管不住，我就特别奇怪。

王天夫：美国黑社会的钱他也管不住，中国黑社会的行为很多。

宋晓梧：咱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房地产里也应该这样，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实现和当时的具体条件。目前我们这个情况来说，有适当的行政控制也不是不可以，本来宏观调控就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就是刚才说美国，美国也曾经闹过这个，行政手段、冻结工资也有过，1962年弄过，反响是步臭棋，当然也不是没有。咱们的房地产现在问题和收入分配有很大关系，我记得曾经说过这个事，我们一直主张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然后国家管什么呢？国家就管最低生活保障，这些人的住房，其他的就放开。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了，而且灰色收入太大了，一个什么房姐他在北京能买30多套房，还有山西煤炭监管的副科长在北京也是30几套房子，那仅仅是暴露出来的，而且最后审了房姐半天，那30几套房是合法的，说明你这个体制就可以让一个县的银行的一个小的官员可以合法的在北京买34套房，这个收入差距造成了有钱人把房子作为投资来炒，没钱的人远远买不起房子。这个事，李强现在说中国是个倒丁字型，真正有钱的人不多，但是你说倒丁字型，我们的奢侈消费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第二了。

王丰：我们现在是消费畸形，20%的GDP能消费全世界最少50%的奢侈品。

宋晓梧：要说不平等挑战，房地产业是挑战，少数极有钱的人在炒房子买房子，一买买30多套，暴出来的就30多套，那是很小的小人物，他把房价抬个很高，他还希望更高，这就是收入不平等造成的挑战。根本上如果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很大，房地产业不会这样。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话的问题了，房地产在现在的收入不平等的环境下，还有各种其他的问题下，采取适当行政控制，我认为好像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基尼系数到0.3左右，房地产肯定不是现在的情况。

王天夫：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的座谈会到此结束。